

# 宋遼唐河、徐河之戰新考

何冠環

香港理工大學

## 導言

宋太宗(976–997在位)在雍熙三年(986)正月再度出兵攻遼，企圖收復幽燕失土。由於整體戰略的失誤，以及統軍的將領臨陣應變的種種錯誤，宋軍在同年五月、七月及十二月先後在歧溝關(今河北涿州市西南)、陳家谷(今山西朔州市西南)及君子館(今河北河間市北君子館)三役中慘敗。到端拱元年(988)初，宋軍已從主動的進攻變成被動的防禦。遼軍得勢不饒人，在以後的兩年不斷向宋境發動進攻，河北州郡因被遼騎侵凌，全線陷入惶恐不安的狀況。據宋人的記載，直至宋軍在端拱元年十一月的唐河(亦名滹河，源出今河北唐縣北，南流經唐縣城東，至今定州市北)之戰，及二年(989)七月的徐河(今稱徐水，源出今河北易縣五迴嶺，東南流，經今河北安新縣注入白洋淀)之戰後，兩番擊敗入寇的遼軍，才扭轉劣勢，使吃緊的邊防轉危為安。

不過，這兩場對宋軍意義重大的戰役，卻不見於遼人的官私記載。究竟是宋人誇大其詞，將小勝仗說成大勝仗，還是遼人諱言其敗？三十年前，臺灣宋史前輩程光裕教授曾撰有《宋太宗對遼戰爭考》一書，其中第十一章〈唐河與徐河之戰〉，引錄了宋遼雙方相關史料作出論述，可惜並沒有討論上述的問題。另在1994年，臺灣東吳大學的蔣武雄教授在他的〈耶律休哥與遼宋戰爭〉一文裏，也有一節專論耶律休哥(?–998)與徐河之役，但論析亦未超過程書。<sup>1</sup> 本文即試在程氏與蔣氏的研究基礎上，補入其他可見的有關記載，重新考訂這兩場戰役的真相。

<sup>1</sup> 參閱程光裕：《宋太宗對遼戰爭考》(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頁162–78；蔣武雄：〈耶律休哥與遼宋戰爭〉，原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二十六期(1994年9月)，現收入宋史座談會(編)：《宋史研究集》(臺北：國立編譯館)第二十八輯(1998年)，頁463–98。

唐河及徐河兩役，宋軍的主將是太宗明德李皇后（960–1004）長兄李繼隆（950–1005）。李繼隆是宋初外戚武將中少數戰功卓著者，他在太宗及真宗（997–1022在位）兩朝對遼對夏的戰鬥，幾乎無役不預。他獨特的指揮作風，是臨陣時隨機應變，不盲從主子或主帥的指令。他在太平興國四年（979）滿城（今河北滿城縣）之戰、雍熙三年君子館之戰出任副將時，臨陣時均依照自己對戰局形勢的判斷，相應地作出行動，而不依照太宗或主帥預先設計的戰法。結果他在滿城之戰以違令而勝，但在君子館一役卻以違令而教主將劉廷讓（929–987）失援而敗。君子館之役，李繼隆擔著怯懦不戰的惡名，而唐河及徐河兩役之得失，正關係著李繼隆軍旅生涯的榮辱，故本文另一重點為考證這位宋初外戚名將在此兩役的戰功。

### 唐河之役

宋軍在君子館之役慘敗後，於太宗端拱改元的頭五個月，北邊尚算安寧。這年閏五月中旬，太宗分別召鎮守高陽關（今河北高陽縣東舊城）、鎮州（今河北正定縣）及定州（今河北定州市）的三員大將崔翰（930–992）、郭守文（935–989）及田重進（929–997）來朝。但不到半月，邊防卻出現危機：在北邊要地平戎軍（在涿州、霸州及莫州間）鎮守的勇將、欽州（今廣西欽州市）刺史陳廷山（954前–988）被知霸州（今河北霸州市）石曦（920–993）指控私通遼大將耶律休哥。陳廷山被宋廷拘捕，隨即押送京師審理。太宗在六月初一以陳廷山通敵謀叛有據，把他誅殺。<sup>2</sup> 前方大將謀反被誅的震撼尚未平息，太宗所倚重的心腹外戚劉文裕（944–988）又在鎮州都部署任上病逝。<sup>3</sup> 面對北邊這番人事變故，太宗一如既往，委派他一大班信任的外戚為他

<sup>2</sup> 考崔翰在端拱元年閏五月十八日自高陽關來朝前，太宗已早在閏五月六日任命洺州（今河北永年縣東南）防禦使劉福（？–991）為高陽關兵馬部署替代。稍後太宗又命他的愛將傅潛（939–1017）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出為高陽關都部署。考劉福後來遷涼州（今甘肅武威市）觀察使判雄州（今河北雄縣），於淳化二年（991）二月卒於高陽關任上。參錢若水（960–1003）：《太宗皇帝實錄》（以下簡稱《實錄》），《四部叢刊三編》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卷四十四，葉9上至12下；脫脫（1314–1355）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7年），卷五〈太宗紀二〉，頁82；卷二百七十九〈傅潛傳〉，頁9473；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9–1995年），卷三十二，頁711。關於陳廷山被誅的本末，可參拙著〈論宋太宗朝武將之黨爭〉中「陳廷山之死與田紹斌之貶」一節，《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四期（1995年），頁193–95。

<sup>3</sup> 劉文裕卒於端拱元年何月不詳，但是年七月二十七日太宗命潘美知鎮州，而八月十日郭守文以宣徽南院使充鎮州路都部署。疑劉文裕已在是年七月底卒，故太宗先後委潘美及郭守文接掌其職。見《實錄》，卷四十五，葉3下至4上；《宋史》卷四百六十三〈劉文裕傳〉，頁13547。



守邊。太宗首先在七月二十五日調其妻舅、懿德符皇后(942-975)之弟符昭愿(945-1001)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市)，接替在同月二十七日調知鎮州的宿將潘美(925-991)。然後在八月二十六日任命太祖(960-976在位)的三個主婿王承衍(947-998)、石保吉(954-1010)及魏咸信(949-1017)分赴貝州(今河北清河縣)、滄州(今河北滄州市)及相州(今河南安陽市)本鎮戍守。接著再委任他的愛婿吳元辰(963-1012)以鄯州(今青海樂都縣)觀察使知孟州(今河南孟州市)，接替右諫議大夫韓丕(?-1009)。<sup>4</sup>而最為太宗倚重的李繼隆自然榜上有名。是年九月初一，太宗命李繼隆以馬軍都指揮使出為定州兵馬都部署，接替易、定兵馬都部署田重進的防務。<sup>5</sup>

太宗調整北邊防務來得及時，因遼聖宗(982-1031在位)早在是年八月九日已決定出兵攻宋而遣使祭永州木葉山(今內蒙古翁牛特旗東部)。就在李繼隆出守定州不久，在是年九月十四日，遼主赴幽州(今北京市)。五日後，遼軍祭旗鼓南伐。據宋人的記載，這次遼軍南犯共有八萬之眾。同月二十六日，遼軍抵達宋軍控制的涿州(今河北涿州市)，向宋軍招降不果，就在十月二日發動進攻。涿州很快被攻破，宋守軍棄城南撤，被遼軍大將耶律斜軫(?-999)及駙馬蕭排押(?-1023)追擊而大敗。<sup>6</sup>十月五日，在宋軍的頑強抵抗下，遼軍仍攻下宋軍要塞沙堆驛，俘獲

<sup>4</sup> 左諫議大夫韓丕在端拱元年閏五月初五出知孟州，至八月由吳元辰接任。另濮州(今山東鄆城縣)防禦使楊贊亦早在閏五月初六日獲委為貝州兵馬都部署，至八月由王承衍繼任。王承衍甚得太宗信任，當他鎮守貝州時，他的妻子昭慶公主(?-1008)不時召入皇宮，太宗對他的姪女且言及諸將得失，甚見親信。當時單州(今山東單縣東南)防禦使高瓊(935-1006)任貝州部署，在王承衍麾下。他對自己沒有像王超(?-1013)、范廷召(927-1001)等獲擢陞，感到失意。王承衍從昭慶公主處知道其實太宗對高瓊另眼相看，遲早會擢陞他，就以此安慰高瓊。到端拱二年，高瓊果然被召還，同年三月他便被擢為步軍都指揮使出為并代都部署。從昭慶公主可以出入宮禁並預聞將領寵用之事，可見王承衍受到太宗寵信。參《實錄》，卷四十四，葉9上；卷四十五，葉3下、8上；《宋史》，卷五，頁82-83；王珪(1019-1085)：《華陽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十九〈烈武高衛王神道碑銘〉，葉3上至3下。

<sup>5</sup> 《實錄》，卷四十五，葉9下至10上。太宗在九月十六日，又委任他兩員藩邸舊人王超和王昭遠(944-999)並為殿前都虞候。

<sup>6</sup> 關於遼軍這次南侵的總兵力，《遼史》並沒有記載。楊億(974-1020)所撰的〈李繼隆墓誌銘〉說遼軍攻定州時，有眾八萬，相信這是宋人對遼軍總兵力的估計。參楊億：《武夷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十〈宋故推誠翊戴同德功臣山南東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行襄州刺史判許州軍州事、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二百戶贈中書令諡曰忠武李公墓誌銘〉(以下簡稱〈李繼隆墓誌銘〉)，葉21下。又遼將耶律休哥與蕭排押等，在端拱元年(即遼統和六年)八月初四，早已作出試探性的行動，統兵至易州(今河北易縣)，遇宋兵，殺宋軍指揮使而還。五日後，遼主即命人祭木葉山。到九月十二日，



宋軍甚眾。二天後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sup>7</sup>同月二十三日，奚六部長奚和朔奴(?-995後)，率領本部兵由別道進擊，攻破易州重要軍事據點狼山寨(今河北定州市西北)，並俘獲宋軍甚眾。同月二十八日，又擊敗宋軍於益津關(即霸州)。<sup>8</sup>兩天後，遼軍進至長城口(在易州遂城縣、即威虜軍附近)。據遼人所記，宋的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為耶律休哥所敗，並被遼軍追擊五、六里。<sup>9</sup>這個「李興」是誰？考當時宋定州守將無人名「李興」，可能又是遼人誤傳，像在君子館一役將李繼隆訛作「李敬源」一樣。<sup>10</sup>這個「李興」雖然不一定是李繼隆的訛稱，不過，當是李繼隆麾下某一部將的訛稱。據《宋史·荊嗣傳》所記，宋勇將荊嗣(?-1014)「又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砦，將赴滿城，道遇敵，疾戰，俘獲甚眾。又戰於鸞女祠」。考北平砦在定州北九十里，雍熙元年(984)置。至於鸞女祠所在不詳，

〔上接頁109〕

耶律休哥又派人將他所虜獲的宋諜者獻上，教聖宗進一步了解宋軍虛實。關於涿州之戰，〈聖宗紀三〉稱遼將蕭恆德和蕭撻覽均在攻城時中流矢，但二人的本傳卻稱他們是在攻沙堆驛時受傷，現從本傳所載。見脫脫：《遼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卷十二〈聖宗紀三〉，頁131-32；卷八十五〈蕭撻覽傳〉，頁1313；卷八十八〈蕭恆德傳〉，頁1343。

<sup>7</sup> 考沙堆驛的確實位置不詳，《遼史》各傳多有提及此地，當在易州境內。關於遼聖宗統和六年(即端拱元年)九月沙堆之戰，據《遼史·耶律隆運傳》所載，韓德讓(即耶律隆運，941-1011)率部圍沙堆，宋軍乘夜來襲，韓不敢輕敵，嚴軍以待，結果擊敗宋軍。又據《遼史·蕭撻覽傳》所記，蕭在是年秋從聖宗南征，攻沙堆而力戰被創。另《遼史·蕭恆德傳》載，當遼軍圍沙堆驛，蕭恆德(?-997)獨當一面。當時城上矢石如雨，但恆德意氣自若，督將士奪其陴。及城陷，蕭中流矢。以此看來，守沙堆驛的宋軍曾力拒遼軍來犯。參《遼史》，卷十二，頁132；卷八十二〈耶律隆運傳〉，頁1290；卷八十五〈蕭撻覽傳〉，頁1313；卷八十八〈蕭恆德傳〉，頁1343。按蕭恆德為蕭排押之弟，二人都尚主，蕭排押另有一弟名蕭札刺。又〈聖宗紀三〉以蕭排押為蕭排「亞」，蕭恆德為蕭「勤」德。據魏奎閣的考證，蕭排押與蕭恆德之父，正是蕭撻覽(凜)。關於蕭家父子兄弟之生平事蹟，可參魏奎閣：〈蕭排押父為蕭撻凜考〉，《遼海文物學刊》(瀋陽)1991年第2期(總第12期)，頁83-86。

<sup>8</sup> 《遼史》，卷十二，頁132；卷七十八〈蕭繼先傳〉，頁11268；卷八十五〈奚和朔奴傳〉，頁1318。按奚和朔奴字籌寧，〈聖宗紀三〉所記之「籌寧」即是他。又參預攻克狼山石壘的，還有駙馬蕭繼先(?-1006後)。

<sup>9</sup> 《遼史》，卷十二，頁132。

<sup>10</sup> 關於李繼隆被訛稱為「李敬源」的問題，亡友曾瑞龍(1960-2003)曾有精闡論述，參曾瑞龍：〈向戰略防禦的過渡：宋遼陳家谷與君子館戰役〉，《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五期(1996年)，頁97及注79。另一可能是宋廷在是月二十九日以步軍都指揮使戴興(?-999)出為澶州(今河南濮陽市)都部署，遼人也許將澶州的戴興與定州的李繼隆的名字顛倒弄錯。參《宋史》，卷五，頁83。



疑即是保州清苑縣的聖女祠。從時間和地理位置來看，《遼史》所記為耶律休哥敗於離滿城不遠的長城口的宋將「李興」，很有可能就是打算從定州北平砦增援滿城，被遼軍截擊的荊嗣。<sup>11</sup>

據《遼史》所記，遼軍在是年十一月初一乘勝進攻長城口，將長城口四面包圍。宋守軍頑抗，但終於在初七失守。宋軍不降，奮勇突圍，但逃脫者不多，被殺者甚眾。同月初八，遼軍圍攻滿城，十一日城破，宋守軍投降。十五日遼軍更深入宋境，攻破祁州（今河北無極縣），並縱兵大掠。十六日再破定州西南五十里的新樂縣（今河北新樂縣東北）。十七日破小狼山砦。二十四日遼軍又在霸州擊潰宋軍千人。遼軍在十二月在宋境休整後，在翌年（端拱二年）正月班師。在回軍中，於同月二十一日進攻宋重鎮易州。宋軍從遂城（即威虜軍）來援，被遼鐵林軍擊敗。同月二十二日，遼軍攻陷易州，宋易州刺史劉墀（？-989後）投降。到月底，遼大軍經收復的歧溝關返南京幽州。這次遼軍南侵，以收復涿州及易州告終。<sup>12</sup>

對於遼軍在端拱元年九月至二年正月的大規模南侵，從宋人所修的《長編》及《東都事略》諸書，到據宋官方記載修成的《宋史》等書，均諱言遭到慘敗。另對涿州得而復失，以及後周世宗（954-959在位）辛苦取得的易州最終給遼人取回，群書

<sup>11</sup> 考《宋史》荊嗣本傳記他「又戰於鸞女祠」，當與上文赴滿城增援而遇敵，為前後二事。據《太平寰宇記》，保州清苑縣東南三十五里外的樊輿城西南隅有聖女祠。考清苑縣原屬莫州，後周世宗取莫州後，宋初在清苑縣建保塞軍，太平興國六年（981）建為保州。然在遼人眼中，清苑仍屬莫州。考《遼史·聖宗紀二》，在端拱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記耶律休哥「獻黃皮室詳隱徇地莫州所獲馬二十四，士卒二十人」。疑這是遼軍與荊嗣在莫州（即保州清苑縣）交戰的戰利品。《宋史》荊嗣本傳沒言明他從李繼隆禦敵於北平砦於何年何月，但李繼隆為定州都部署在端拱元年九月，而下文又提及唐河橋，並言及他與耶律休哥交戰，則他所參預的殆為唐河之役無疑。當然，《宋史》說荊嗣擊敗遼軍，「俘獲甚眾」，與《遼史》說遼軍戰勝，都是自說自話。大概是互有傷亡，不分勝負。只是荊嗣被遼軍所阻，無法援救滿城。參《宋史》卷二百七十二〈荊嗣傳〉，頁9313；《遼史》，卷十二，頁132；樂史（930-1007）：《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六十八〈保州〉，葉1上至3上；王存（1023-1101）（撰）、王文楚、魏嵩山（點校）：《元豐九域志》（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卷二〈定州〉，頁78-80。

<sup>12</sup> 《遼史》，卷十二，頁132-33；卷八十八，頁1341-42。考遼收復滿城，奮勇先登的是蕭排押，他以功改南京統軍使。而攻克長城口，奮勇先登的是蕭排押之弟蕭恆德。關於遼收復易州的年月及相關問題，可參閱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載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年），頁1-19。又端拱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宋遼遂城之戰，《宋史·王榮傳》記有「王硬弓」之稱的龍衛都指揮使王榮（947-1016）曾在端拱初「率兵戍遂城，邊騎來寇，擊敗之，擒千餘人」。疑在端拱二年正月領兵自威虜軍來援易州的宋軍，即是王榮所部。參《宋史》卷二百八十〈王榮傳〉，頁9499。



均語焉不詳。<sup>13</sup> 反而從楊億的〈李繼隆墓誌銘〉到李燾的《長編》等書，卻大事渲染李繼隆與其副將、定州監軍袁繼忠(938–992)，在端拱元年十一月，以二萬之眾，在定州州治安喜縣北八里的唐河，大破遼軍八萬，並一直追殺越過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為了加強這次勝仗的真實性，宋人還特別描述李繼隆所以能「以寡勝眾」，在於他不墨守太宗在諸將出征辭行時所授的以堅守不出為主的作戰方略。他自己判斷形勢，拿定主意出擊遼軍，並接受監軍袁繼忠的建議，重用驍勇的易州靜塞騎兵為選鋒。在楊億及李燾筆下，李繼隆和袁繼忠均智勇兼備，忠義過人。據《長編》所記，李繼隆首先在戰前聽從袁繼忠的意見，安撫易州諸寨失守後原屬諸寨的靜塞驍勇騎兵，為撫慰他們丟失妻兒之痛，特別遷陞其軍額，並優以廩給，又將他們配置於袁繼忠麾下。後來這支精銳騎兵，成為攻破遼軍的一路奇兵。然後當遼軍來勢洶洶，兵鋒直指唐河北時，定州諸將均不敢出戰，而主張遵照太宗詔書，實行堅壁清野，不與遼軍交戰。但袁繼忠力主出兵迎戰，認為「契丹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略他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據說袁繼忠辭氣慷慨，鎮伏了諸將，但膽小怕死的監軍內侍林延壽等五人仍堅執太宗詔書不可違抗，不同意出戰。身為主帥的李繼隆在這關鍵時刻發揮作用，他完全支持袁繼忠的主張，再一次表現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為將宗旨，他說「闔外之事，將帥得專焉」。他又表示「往年河間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他是主帥，又是后兄貴戚，區區幾名小黃門自然阻不了他，結果他與袁繼忠率軍出擊。據《宋史·荊嗣傳》的說法，李繼隆出擊前，預先派步兵二千，埋伏於定州古城下。遼軍進攻定州，李繼隆派守禦於定州北九十里的勇將荊嗣來援。荊部抵唐河橋，扼橋路出戰。他突破遼軍包圍數重，與伏兵會合，分為三隊，背水列陣。這時耶律休哥率騎百餘隊臨烽臺挑戰，荊嗣整兵與遼軍戰數合。這時李繼隆的主力到來，在東邊列陣，合擊遼軍。在擔任李軍摧鋒的易州靜塞騎兵奮勇攻擊下，遼陣被攻入，遼騎大潰。太宗聞得捷報大為嘉獎，袁繼忠特別得厚賜，而荊嗣也得到嘉獎，遷天武軍都指揮使，領澄州(今廣西上林縣西)刺史。而〈李繼隆墓誌銘〉進一步褒揚李繼隆的功

<sup>13</sup> 據《宋會要》所載，田重進在雍熙三年十二月五日在定州上言，他所部已攻下歧溝關，殺守城千餘人，並獲牛羊積聚器甲甚眾。又據《宋史·太宗紀二》所載，田重進在雍熙三年十二月初五攻下歧溝關。惟據曾瑞龍的考證，田重進早在雍熙三年十一月底已奪回歧溝關，而據《遼史·聖宗紀三》的記載，遼要到端拱元年十月才攻克涿州。至於易州，自從周世宗收復後，直至端拱二年正月，一直由宋控扼，《遼史·地理志》清楚記載直至統和七年(即端拱二年)才被遼人收復。參徐松(1781–1848)(輯)：《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會要》)，國立北平圖書館1926年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7年)，〈蕃夷一之十一〉；《宋史》，卷五，頁79；曾瑞龍：〈向戰略防禦的過渡〉，頁99–100；《遼史》，卷十二，頁131–32；卷四十〈地理志四·易州〉，頁498。



勞，稱由於宋軍在唐河的大捷，遼軍不敢再犯。當這一年河北各州包括鎮州、邢州（今河北邢臺市）及洺州（今河北永年縣東南）各郡，均以遼軍入寇而只得閉城不出，定州卻可以「芻蕘無廢」。<sup>14</sup>

假如上述的記載屬實，遼軍在這次南侵就吃了一場極大的敗仗。傷亡或被俘萬人及丟失戰馬萬匹並不是小數目，領軍的遼將一定受到嚴厲的處分。考諸《遼史》，我們找不到任何一個參預端拱元年底南侵的遼將因戰敗被嚴懲。雖然在宋遼戰爭中，雙方都習慣誇大自己的勝利，而諱言戰敗。但遼軍倘真的在唐河為李繼隆大敗，且傷亡慘重，在《遼史》中當也有蛛絲馬跡可尋。不過，在《遼史·聖宗紀》中我們只看到遼馬軍司的都頭劉贊等三十人，以攻祁州和定州新樂有功而獲賞的記載，而沒有載甚麼人因戰敗受責。<sup>15</sup> 另在《遼史·耶律磨魯古傳》中亦記載遼北院大王耶律磨魯古（？-988）在是年擔任先鋒伐宋，曾與耶律奴瓜（？-1012後）「破其將李忠吉於定州」。筆者懷疑這個定州「李忠吉」，正是李繼隆的訛稱。另外在同書的〈耶律奴瓜傳〉中亦記耶律奴瓜在「〔統和〕六年，再舉，將先鋒軍，敗宋游兵於定州，為東京統軍使，加金紫崇祿大夫」。雖然我們無法證明遼軍所謂在定州打敗宋軍的說法屬實，但按照《宋史·荊嗣傳》的說法，被李繼隆與荊嗣合力打敗的遼軍，似乎只是耶律休哥的騎兵百餘隊而已。遼軍並未受到重創。<sup>16</sup> 其實，即使在根據

<sup>14</sup> 關於這支易州靜塞騎兵的來源，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一文考證為屬於易州諸寨的部隊，而並非守易州的部隊（頁4-9）。又宋遼雙方出動兵力的數字，《長編》、《遼史》、《會要》、《宋史》各書均不詳，惟〈李繼隆墓誌銘〉稱遼軍八萬，宋軍二萬。在〈李繼隆墓誌銘〉中所記李繼隆的豪語，與《長編》及《宋史》所記大致相同。只是稱袁繼忠附和他，「躍馬從之」，而不是他附和袁出戰之議。至於唐河一戰的戰果，〈墓誌銘〉說李袁大軍大破遼軍於唐河，追奔數十里，俘敵以萬計。關於太宗不許出戰的詔旨，據《會要》所記，當郭守文出守鎮州時，太宗吩咐他說：「夫用兵者先須料敵，知其強弱，明於動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鎮、定、高陽關三處，控扼來往咽喉道路，若是蕃賊不顧前後，容易矜驕，則用兵掩殺，萬不失一。假如馬一指揮，選取驍勇者，弓箭鎗劍間雜，分作十隊。若十指揮即為百隊，乃至三、四百隊，亦准此例。今於諸班內募願指揮者，分充押隊。若虜敢踰鎮、定而來，不要便殺，但為詐怯，連馳以聞。朕當立發駕下精銳向北逐去，度彼事勢，偷取蕃號，必然穩便，則分佈隊伍，縱兵亂殺。若是得勝盡殺取。若是未捷，各歸城寨，此百戰百勝之謀也。」然而太宗最後又說：「苟隨機所見，別有控便，亦不拘此。」任由諸將決定是戰是守。準此，李繼隆其實沒有違背太宗的詔旨。參《長編》，卷二十九，頁657-58；《宋史》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6；卷二百五十九〈袁繼忠傳〉，頁9005-6；卷二百七十二〈荊嗣傳〉，頁9313；〈李繼隆墓誌銘〉，葉21下；《會要·蕃夷一之十三》及〈十四〉。

<sup>15</sup> 《遼史》，卷十二，頁132。

<sup>16</sup> 同上注，卷八十二〈耶律磨魯古傳〉，頁1296；卷八十五〈耶律奴瓜傳〉，頁1316；《宋史》，卷二百七十二，頁9313。



宋人記載寫成的《宋史》，也不全是宋軍打勝的記載，考《宋史·田敏傳》所記，李繼隆的部隊與遼軍交鋒時，初戰不利。稱當遼軍攻唐河北，李繼隆遣部將逆戰，即「為敵所乘，奄至水南」。<sup>17</sup>伍伯常指出後來稱田敏(?-1023後)以百騎奮擊遼軍，甚麼「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眾」，都不過是誇大之詞，只旁證了宋軍在反擊遼軍的兵力有限。<sup>18</sup>事實上，唐河之役後，遼軍在宋境留至年底，並在翌年輕鬆地取得易州等各城。如果李繼隆真的重創遼軍，遼軍就沒有這樣來去自如了。順帶一談，李繼隆的名字不見諸《遼史》。教人不解的是，若李繼隆曾在這場戰役中重創遼軍，遼人沒有道理連他的名字都記錯成「李敬源」或「李忠吉」的。和遼軍交手的宋將，從有「楊無敵」之稱的楊業(935?-986)，到曹彬(931-999)、崔彥進(922-988)、田重進、潘美、米信(928-994)、劉廷讓以至楊重進(922-986)和賀令圖(948-986)，《遼史》都清楚著錄他們的名字，而偏偏李繼隆的名字，在《遼史》裏不是張冠李戴，就是連生死都弄不清楚。<sup>19</sup>從這一點看，不得不教人懷疑，李繼隆的戰功是宋方杜撰的了。

這場《遼史》沒有記載的唐河大戰，筆者懷疑只是宋方誇大戰果的一場小型反擊戰。考諸《遼史》的相關記載，遼軍的主力一直不在定州一線，前述的遼將耶律磨魯古和耶律奴瓜進攻定州的部隊，只屬偏師。也許李繼隆的部隊在是年十一月曾擊退由耶律休哥率領來犯的百餘隊遼騎，但並沒有改變遼方奪取涿、易二州大獲全勝的事實。遼軍這次南犯，戰略目標是奪回邊上的涿州和易州，對深入宋境的州郡，其實並沒有佔領的意圖。對於宋軍重鎮的定州和鎮州，遼軍只派少量軍隊佯攻，志在牽制該地的守軍不敢輕出救援，讓遼軍能從容地奪取涿州和易州。事實上，遼軍的目標完全達到。諷刺的是，據《會要》所記，李繼隆以至在鎮州的郭守文均上奏太宗吹噓他們擊敗遼軍，並大獲全勝。宋廷收到捷報後，宰臣(不知是趙普(922-992)還是呂蒙正(944-1011))為了討太宗的歡喜，馬上率百官詣崇德殿稱賀。<sup>20</sup>我們不知道太宗這趟實在被臣下所欺，還是他為了激勵士氣，故意授意或

<sup>17</sup>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田敏傳〉，頁10533。

<sup>18</sup> 伍伯常：〈易州失陷年月考〉，頁8及注37。

<sup>19</sup> 考在《遼史·聖宗紀三》中，宋將曹彬、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美、楊業、賀令圖以至楊重進的名字都沒有寫錯，但在《遼史·耶律休哥傳》中，卻說耶律休哥擊殺宋將李敬源，按李敬源即李繼隆之訛稱，似乎遼人對李繼隆的生死都弄不清楚。參《遼史》，卷十一，頁120，126；卷八十三，頁1301。

<sup>20</sup> 據《會要》所記，守鎮州的郭守文亦報稱他與李繼隆出精兵背城而陣，「蕃賊盡銳來薄我師，繼隆號令將士，一鼓而破之，殺獲甚眾」。此點記載除不盡不實外，還似有爭功的嫌疑。而根據宋人官方紀錄所寫的《宋史·太宗紀二》更只說「十一月己丑，郭守文破契丹於唐河」。按李燾已考證唐河之役與郭守文無關，而事實上遼軍並無精銳盡出來攻定州。參《會要·蕃夷一之十三》；《宋史》，卷五，頁83；卷二百五十九〈郭守文傳〉，頁9000；《長編》，卷二十九，頁658。



默許李繼隆等編造不實的戰果。事實上，太宗在歧溝關、陳家谷和君子館三役連遭敗北，他實在需要一場大勝仗挽回面子。同樣，李繼隆在君子館一役蒙羞，他也需要一場漂亮的勝仗來雪恥。唐河一戰當然是他恢復名譽的良機。他是太宗外戚中最善戰的，由他扮演戰勝遼軍的英雄，在一定程度上也維護了太宗用人惟親的政策。最後值得一提的是，元人修的《宋史·李繼隆傳》在這裏倒實事求是，沒有誇大李的戰功，只說：「一日，契丹驟至，攻滿城，至唐河。」李繼隆「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而並沒有像《長編》及《會要》那樣，渲染李大破遼軍，並斬首萬級，奪馬萬匹。<sup>21</sup>

### 徐河之戰

徐河之戰與唐河之戰相同，是一場宋軍對遼軍入侵的反擊戰。事實證明，遼軍在唐河一戰後，並沒有受到宋人所誇大的重創，仍舊找機會入侵宋境防守薄弱的地方。這場戰役的雙方的爭逐點是宋北邊前沿的威虜軍（威虜軍本為易州遂城。太平興國六年建為威虜軍，景德元年〔1004〕改為廣信軍，今河北徐水縣西遂城）。據宋人的記載，這場戰役本來是遼軍乘隙主動攻擊護糧至威虜軍的宋軍，但後來遼軍反被宋軍出奇不意偷襲而敗北。

當遼軍在端拱二年正月取得易州，並不時入侵宋境，太宗只好詔文武大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戶部郎中張洎（934—997）指出宋軍採取消極防禦政策之不妥，他說：「今河朔郡縣，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大小，咸浚隍築壘，分師而守焉。及乎賊眾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是漢家郡縣，據堅壁，囚天兵，待敵寇之至也。所以犬羊醜類，莞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壁，國家常以一邑之眾，當戎人一國之師。既眾寡不侔，亦敗亡相繼，其故無他，蓋分兵之過也。」他請求「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據而守焉。仍環舊城，廣創新寨，俾士馬擊戎逐寇，便於出入」。張洎稍後再上奏，主張「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罷廢。既省朝廷供給，又免戎狄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鎮，緣邊大鎮甲兵既聚，士馬自強，以守則無易州傾陷之危，以戰則有蕃漢力均之勢，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燃，豈可同年而語？」張洎即主張放棄在前沿的威虜軍。<sup>22</sup>當太宗一度接受張之意見，下詔廢威虜軍時，定州都部署李繼隆上奏反對，說「梁門為北門保障，不可廢」。太宗最後聽從李繼隆的意見，保留威虜軍。<sup>23</sup>

<sup>21</sup> 《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6。

<sup>22</sup> 《長編》，卷三十，頁667—68，684—85；《元豐九域志》卷二〈廣信軍〉，頁88。

<sup>23</sup> 按〈李繼隆墓誌銘〉亦記李繼隆「在北邊日，嘗奉詔廢威虜軍，公上言以亭鄣之設，不〔下轉頁116〕



張洎與李繼隆在防禦遼軍入侵的策略，以至威虜軍存廢的問題上誰對誰錯，不宜輕率地從紙上作出判斷，雙方都有他的道理。不過，李繼隆在是年七月卻面臨一次重大考驗，他因運送輜重至威虜軍而遭遼軍在徐河邀擊，幸而他麾下的勇將尹繼倫(947-996)出奇制勝，才使他度過這個難關。

據《太宗實錄》、《長編》及《宋史》的記載，在這年七月，威虜軍糧餽不繼，太宗命李繼隆發鎮、定大軍一萬人護送輜重數千乘前往，他的副將有鎮州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范廷召。但宋軍的行動給耶律休哥諜知，即親率精銳三萬騎南來邀擊。在是月二十二日，崇儀使、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剛好率領步騎千人巡邊塞上，在道上遇上遼大軍。耶律休哥看不起這支只有千人的宋軍，竟不擊而過，逕向前找李繼隆的大軍攻擊。尹繼倫分析形勢，耶律休哥大軍不管對李繼隆軍打勝打敗，都會回過頭來撲打他們這支小部隊，為了死裏逃生，他主張「捲甲銜枚襲其後」。他估計耶律休哥恃銳氣前去，一定心中輕視尹的部隊，而不虞尹軍會隨後掩擊。尹的部下都同意他的主張，他們乘夜暗中尾隨遼軍。遼軍行軍數十里，到達唐河與徐河之間。這時天未明，遼軍距離李繼隆的大軍四十五里，而尹的部隊這時早在威虜軍城北列陣以待。遼軍不知尹的部隊已在旁窺伺，而下令進食，打算食畢向李繼隆大軍發動攻擊。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尹繼倫趁遼軍進食沒有準備時，出其不意的發動突襲。結果殺遼將一人，而遼軍主帥耶律休哥正在進食，措手不及，為宋軍短兵重創其臂，被迫乘馬落荒而逃。遼軍失了主帥，不知宋軍從何而來，因而大潰，自相踐踏而死者無數。李繼隆的副將范廷召見遼軍忽然大亂，即揮軍配合尹繼倫追殺遼軍，追奔過徐河十餘里，據稱斬首數千級，並俘獲遼軍甚眾。其後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939-1004)又敗遼軍於曹河之斜村。太宗戰後論功行賞，授尹繼倫洛苑使領長州(今越南南定省)刺史，繼續任北邊都巡檢。後來知尹繼倫為遼人所畏，稱「當避黑大王」，就加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sup>24</sup>

〔上接頁115〕

可徹備。迄今賴之」。又按張洎曾言，有議者反對廢威虜軍，說「國家比創此軍，以捍蔽定州，此軍若廢，則北戎立至城下」。疑這個議者就是李繼隆。參《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6；〈李繼隆墓誌銘〉，葉28上；《長編》，卷三十，頁683。

<sup>24</sup> 《宋史·太宗紀二》將尹繼倫打敗遼軍繫於七月二十三日辛丑，則他當在前一天(二十二)遇上遼軍。參《實錄》，卷七十八，葉14下至15上；《長編》，卷三十，頁682-83；《宋史》，卷五，頁84；卷二百五十七，頁8966；卷二百七十五〈孔守正傳〉，頁9371；〈尹繼倫傳〉，頁9375-76；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傳〉，頁9698。關於宋人所記遼軍被殺的大將「皮室相」究竟是誰，《遼史》沒有提及，暫未可考。據《宋史》尹繼倫本傳所載，在淳化初年，著作佐郎孫崇諫從遼逃歸，太宗詢以邊事。孫極言徐河之戰大挫遼人銳氣，每聞尹繼倫的名字，就不知所措。太宗才知道徐河之戰的真正英雄是尹繼倫，於是再將尹陞為尚食使，領長州團練使，以激勵邊將。



除了《宋史·李繼隆傳》將這次徐河之役的勝利歸功於李繼隆外，《宋史》其餘各有關紀傳，都據實以功勞歸於尹繼倫。另外《宋史·王杲傳》亦稱郭守文的大將王杲(939–1002)當時亦剛好督糧至威虜軍，當他所部還抵徐河時，尹繼倫正與敵廝殺，王杲部適遇遼軍於河上，於是加入戰鬥。他倒沒有誇大戰功，只報上「殺賊，奪所乘馬」。郭守文為他報功，太宗召見他問狀，以功補馬軍都軍頭。至於〈李繼隆墓誌銘〉這回較老實，只含糊的說李繼隆「又出奇兵，薄西山以邀虜，虜亦引避」。並沒有大大渲染李在徐河一役的功勞。出於《長編》的《皇宋十朝綱要》亦只將擊敗遼軍的功勞歸於尹繼倫。<sup>25</sup>

《遼史》對是年七月的徐河之役沒有具體的記述。《遼史·聖宗紀三》曾記在五月十三日，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且駐易州，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師」。遼主從其議。又記耶律休哥與蕭排押在六月，奏破宋兵於泰州(即宋的保州，徐河即在保州北面十里)。到七月十五日遼主「遣兵南征」，到十九日「勞南征將士」。但跟著就沒有記這支南征軍戰況如何。考諸《遼史》，〈耶律休哥傳〉和〈蕭排押傳〉都沒有記二人在是年曾南征宋。筆者懷疑《遼史》諱言其敗，尤其耶律休哥是遼的百勝將軍，這番因輕敵而栽在尹繼倫手上，自然諱莫如深。<sup>26</sup>相比唐河之役，宋軍在徐河擊敗遼軍較為可信。另外，客觀的效果是遼軍在太宗之世沒有再大舉入寇。我們不知耶律休哥是否真的如宋人所記其臂受重創(可能致殘)，故此終其餘生都不能領軍南犯。按《遼史·耶律休哥傳》說他不再向宋用兵，是因他厭戰，故願息兵休戰，「以燕民疲弊，省賦役，戒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sup>27</sup>當然，我們沒法證明耶律休哥後來息兵休戰與他的創患及身體健康有多大的關係。不過，宋軍能教高粱河(源於今北京城西直門外紫

<sup>25</sup> 《宋史》李繼隆本傳稱他預先佈置尹繼倫的伏兵於城外，又將領軍追敵於徐河的功勞寫上李繼隆，顯然有溢美之嫌。考《東都事略》也將功勞歸於李繼隆，又說遼軍有八萬之眾，比《宋史》更為誇大。參王稱(?–1200後)：《東都事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卷二十，葉3上；《宋史》，卷二百五十七，頁8966；卷二百八十〈王杲傳〉，頁9504–5；〈李繼隆墓誌銘〉，葉二十一下；李焘(1161–1238)：《皇宋十朝綱要》(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卷二，葉15下。

<sup>26</sup> 《遼史》，卷十二，頁135；卷八十三，頁1301；卷八十八，頁1341。據范成大(1126–1193)的記載，從定州北行一百二十里，即至保州；再北行十里，便抵徐河，再過十里，則是曹河。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攬轡錄》(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2002年)，頁22。

<sup>27</sup> 《遼史》，卷八十三，頁1301。按蔣武雄亦懷疑耶律休哥沒有參預至道元年(995)正月與四月的子河汊之役與雄州之役，可能是因徐河之役手臂受傷而無法打仗所致。蔣氏並因此論斷宋在徐河之戰獲勝，影響甚大，因此戰令耶律休哥不再出現在遼宋戰場上。參蔣武雄：〈耶律休哥與遼宋戰爭〉，頁485。



竹院公園，東流至今德勝門外，折東南流斜穿今北京內外城，至今十里河村東南注入古歙水，今永定河前身)一役的遼軍英雄耶律休哥受重創，也可算為太宗報當日被耶律休哥所部遼軍射傷之仇。宜乎太宗後來厚賞尹繼倫。公道而言，李繼隆在這次僥倖得來的勝仗中的功勞，多少是因人成事。宋軍不敗反勝，與其說他有多大戰功，不若說他運氣不錯。一代名將的耶律休哥竟然因輕敵而敗北，既教尹繼倫得以成名，也教李繼隆在雍熙與端拱年間的軍旅生涯得以平安度過。<sup>28</sup>

## 結 論

宋人大書特書的唐河及徐河之役，是宋太宗二度伐遼慘敗後宋軍在定州戰區所取得的兩場勝仗。不過，比對宋遼雙方的記載，唐河之役其實是宋方誇大戰果的一場小型反擊戰，真正取得勝利的，是收復易州及涿州的遼軍。至於徐河之役，本來因宋廷不願放棄在宋遼邊境前沿，守軍不足而補給困難的威虜軍，而使遼佔有可進可退的優勢。當遼將耶律休哥親統大軍，趁著宋軍護糧至威虜軍的機會，準備向宋軍邀擊時，卻因臨陣輕敵而敗於宋將尹繼倫的奇兵手上。唐河及徐河之役的勝利，在相當程度重振宋軍的士氣。尤其是徐河之役，宋軍在劣勢下竟然打敗並刺傷了遼的無敵將軍耶律休哥。端拱以後，宋遼未有大規模的戰鬥，遼史歸功於耶律休哥的和平政策。不過，他對宋政策的改變，未必與徐河之役受挫無關。

李繼隆是唐河及徐河之役宋軍的主帥，他維持一貫作風，臨陣隨機應變，不盲從太宗的指令。唐河之戰雖然只是小勝，但他聽從袁繼忠的意見，不理監軍中使的反對，冒著干犯違抗太宗旨意之罪，引軍出擊而勝，也是值得肯定的事。當然，太宗利用李繼隆這次小勝，掩蓋丟失易州及涿州的事實，並向人證明他任人惟親並無不妥，才是唐河之役後宋廷大吹大擂的真正原因。李繼隆在徐河之役雖是宋軍戰區的最高指揮官，但他並未主動策劃這一場戰鬥。宋軍僥倖得勝，真正的英雄是臨危應變極出色的勇將尹繼倫，李繼隆這次領的功勞，一半是因人成事。但敢於隨機應變，不盲目遵從主帥命令，是李繼隆及其部下的一貫作風；亦為此，李繼隆所部的宋軍才得以在唐河及徐河之役取得勝利。說李繼隆統軍有方，也不算誇大其辭。

<sup>28</sup> 據宋人所記，尹繼倫面黑，遼人因稱之為「黑面大王」。在徐河一役後，遼人對他既敬且畏，平日相戒，則說「當避黑面大王」。參《宋史》，卷二百七十五，頁9376。關於太宗在太平興國四年高粱河一役中箭受傷及其後遺症，可參見拙著〈宋太宗箭疾新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二十卷（1989年），頁33-58。



# Reappraisal of the Battle of Tang 唐 River (988) and the Battle of Xu 徐 River (989) between Song 宋 and Liao 遼

(A Summary)

Koon-wan Ho

In the middle of 987, Song Taizong 宋太宗 (r. 976–997) launched his second Northern campaign aimed at recovering the Yan Yun 燕雲 Territories from the Liao Empire. However, the Song troops were defeated in three decisive battles in the same year. Since 988 the Liao army stormed its counter-attack probably for revenge. Most of the Song prefectures on the Song–Liao border were attacked. The Song troops who had been weakened by the previous defeats could do the best by locking themselves in their wall-cities. According to Song accounts,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war was the Battle of Tang River (988) and the Battle of Xu River (989) at which the Song troops, under the command of General Li Jilong 李繼隆 (950–1005), the brother-in-law of Song Taizong, had managed to defeat the Liao army and successfully restored the morale. However, when we cross-examine the validity of the Song records with the Liao sources, nothing has been mentioned about the two battles which the Song claimed victor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truth of the Song accounts on the two battles by comparing the Liao sourc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ong people had purposely exaggerated their victory at the Battle of Tang River. The Liao troops who had been defeated by the Song army stationed at Dingzhou 定州 was only a minor force numbered around one to two thousands. On the contrary, the Liao major force led by Liao Shengzong 遼聖宗 (r. 982–1031) was successful in recapturing the two strategic prefectures Yizhou 易州 and Zhuozhou 涿州 from the Song. As a matter of fact, Song suffered from great loss in 988. It is highly possible that Song Taizong deliberately exaggerated the minor victory at Tang River to cover up the grave defeat of Song army at Yizhou and Zhuozhou.

It is also found that at the Battle of Xu River, the Liao army commanded by the military genius Yelü Xiuge 耶律休哥 (?–998) was defeated by the Song troops led by a junior military official Yin Jilun 尹繼倫 (947–996) in an unexpected circumstance, partly due to Yelü's own misjudgment and excessive confidenc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or the sake of Yelü Xiuge, nothing was mentioned about the Battle of Xu River in the Liao official records, although it had been recorded that the Liao troops had evidently marched southward in the same period of time.

In terms of importa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ong–Liao War, the Battle of Xu River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ang River. In the Battle of Xu River, the Song army was able to defeat Yelü Xiuge, the Ever Victorious General of Liao. And, to a large extent, this unexpected victory had greatly enhanced the morale of the Song troops. In addition, it was



highly possible that due to his serious wound left at the Battle of Xu, Yelü did not appear at the battlefield ever since.

Regarding the merits of Li Jilong in the victories of the two battles, it is found that his contributions had also been exaggerated, although his skill of command in battlefield was evidently better than many Song field commanders who only strictly followed the emperor's instructions.